

关于“文学花盆”

从前我一直以为,卖花的人因了常年和花朵、植物在一起,面容应该是从容而有生气的,性情也多半会诚朴、安静。但是我在很多时候遇到的卖花人并非如此。他们急躁、冷漠、不诚实。面对你感兴趣的一盆花朵或绿叶植物,茉莉花、君子兰或者龟背竹、巴西树,他们不耐烦向你介绍这些花朵树木的脾气秉性,只急于让那些花出售。当你再三追问该如何养护即将买回家去的花朵,比如浇水的间隔时间,还有哪些花喜欢日照,哪些花喜欢阴凉等等,他们的回答则经常含混不清,他们会应付、甚至打发你似的说,怎么养都行,怎么浇水都行。他们一边说着,一边侍弄着手尚未出售的花。他们忙着往君子兰肥厚的叶片上喷洒光油,又拿起喷壶往一株名为龙血的树上喷洒叶绿素,接着再给茶花和“仙客来”的盆子里施一点花朵鲜艳剂。经过几番化学喂养的花朵们果然精神非凡,伸着脖子摇晃着油汪汪的头,呈现出某种突击出来的不自然的亢奋——宛若刚刚吸食过摇头丸之类吧?当然不会!

有时我想,如果不恰当地把文学比做花朵和植物,那么作家是种花人呢,还是卖花人呢,像我前边描述过的那样的卖花人?这是一个喧嚣的、求快的时代,花朵也喧嚣。这是一个不求甚解的时代:花卖了,花插在塑料上了,花死了,与我何干?而我们的有些文学,因了时代的种种诱惑和市场的高声催促,又正如那些涂亮光油、打叶绿素、铺泡沫塑料的盆花一样,亢奋、光鲜,却说死就死。我们的有些作家,也正像一些这个时代特有的卖花人一样,每天繁忙地鼓捣着文学“花盆”,却并不爱花,甚至对它急躁、冷漠、不诚实。

新年时我读到法国作家热拉尔·马瑟的散文《年轻人与死神》,其中有一小段叙述令我感触深刻,他写道:“在这个故事中,我们再次领略到东方人描写命运的方式:没有长篇累牍的叙述,只有一个悄悄的手势或几颗书法字。命运的警示似闪电一划而过,根本没有反应的机会。”我注意到的是作家用几“颗”书法字来形容东方的文字,而不是几行、几段、几串、几磅。在这里,“颗”得到了强调,我突然意识到这强调的宝贵——我的母语,汉字的宝贵。一颗珍珠,一颗钻石,一颗种子,一颗星星……一颗汉字。进而我想到,我们必须重视文字和语言对于一个作家的宝贵。那些打动我们灵魂、呼唤我们思想的文字不可能是涂满光油的,扎根在泡沫塑料里的植物,它们的根系只能谦逊而执著地深埋在厚实的泥土中。就作家所应秉持的信念而言,文字有时的确比生命更重要。不要像卖花人打发花朵那样慷慨“施肥”,不要优待的虐待。面对有难度的文学,有时我们同样需要节制和吝啬,需要尊重文学的本意,就像卖花人应当尊重花朵生长的本意。

今天的社会为什么需要文学?今天的读者为什么要读诗和小说?也许那是因为文学能够呼唤出潜伏在你心中诸多你所并不深知的情感,从而激起你多样的思想或某些隐秘的美感。你因思想而欢愉,你因欢愉而思想。这时的思想就如中国诗人西川所言:“思想不是填空练习,思想是另起炉灶。思想到极致的人,即使他悲观厌世,他也会独自鼓掌大笑。”

但是,当作家不断企图用如前所述的那些“文学花盆”来打发读者时,文学首先会向作家说再见,接着作家将会被今天的每分钟都有新创意的社会所抛弃。

因此我说,作家要有文学野心,同时要对自己充满警惕。

摘自《中华读书报》1月26日 铁凝/文

学术造假
摘自人民网 宋嵩作



一场“春天里”的文化风暴

从出租屋唱上了“星光大道”,随后唱进央视春晚,旭日阳刚完成了从草根到明星的重大转身。这段成功绕不开汪峰的扶持。汪峰自然明白《春天里》的价值,也明白翻唱对自己到底意味着什么,对背后的文化与市场的秩序又意味着什么。围绕着《春天里》的种种争议,都是基于这种理解生发出的碰撞。

这种文化冲突,并不只存在于汪峰与旭日阳刚之间,还有他们背后的团队以及社会各个领域。一首《春天里》击穿许多人,维系着很多人的尊严、利益与权利。当汪峰不让旭日阳刚演唱这首歌,自然会激发起众人的情绪,带来各种争议。

文化冲突的风暴生成了,文化差异越大,参与人群越多,风暴就越激烈。比如,是旭日阳刚唱红了《春天里》,还是《春天里》唱红了旭日阳刚,这其实既有文化与市场复杂的逻辑关系问题,也有艺术本身的价值界定问题。种种不同的社会心理因素,影响着不同人群看待汪峰与旭日阳刚在《春天里》的价值权重。

旭日阳刚曾经的生存状态作为时代的表征,容易激起人们的情感共鸣,对音乐介入现

实生活无疑作出了贡献。但这又绝不是消解《春天里》本身文化价值的理由。

当然,汪峰给予过旭日阳刚最大的帮扶。当旭日阳刚以大量商演冲击特定版权秩序,客观形成对汪峰及其团队利益冲击的情况下,作为理性经济人的汪峰选择拒绝赐予,并不承担道德责任,也具有一定的法律理性。他在这一事件中展示的文化包容与秩序守护,应该得到尊重、理解,甚至是激赏。这并不意味着汪峰能够摆脱诸如酸葡萄心理、心胸狭隘之类的指斥,汪峰还是无法从文化风暴轻松抽身。

而在这个多元化的时代,在这个价值溃散的年代,不同人群之间也呈现出严重的文化分层。文化分层又远比社会分层更为复杂,很多时候,它并不能简单地以经济指标与身份地位来衡量。如果不能通过理性的文化对话,真正形成对文明与秩序的普遍坚守,任何人都可能遭遇到精神与权利的剥夺。只有在文明与制度的底线上,《春天里》才能先属于汪峰,再属于所有人,成为一种文化力量介入社会生活。

摘自《中国青年报》2月15日 单士兵/文

说“小说死了”,小说没有死。但是,小说它皮包骨头,浑身都是巨大的关节。“形销骨立”这个成语已经成了“小说”最为生动的写真——它还站在那里,只是没了人样。小说之所以还能站在那里,长篇小说给出了非常吃力的支撑。至于短篇小说,即使它还活着,充其量也就是个植物人。

短篇小说的本质其实并不在短,而在它有味道。品尝味道需要时间,也许还需要智慧。小品或段子才是这个时代最需要的,30秒钟内我们就可以痛快地笑出眼泪。短篇小说是什么?在我看来它就是节日里的家宴。它重要吗?没那么重要。几个人围在自家的餐桌上,各自说一些闲话,言不及义。但是,因为有人生的常态在,有最基本的生老病死在,家宴比家里人“吃饭”要丰富得多。父亲刚刚做了手术,大家偏偏就

小说中的小说

不提健康的事;大姐夫刚刚做坏了生意,一桌子偏偏就不提钱的事——这反而变成了潜台词,潜台词所构成的东西也许是意义,也许只是一种无法复制的氛围。如此这般,生活里最生动的局面出现了: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不只是如此这般——多年之后,你的父亲已在天堂,你的大姐夫已在遥不可及的地方,你忘记了餐桌上的每一道菜,可你就是不能忘记老父亲吃鱼头的样子。灯光底下,他没有牙的嘴巴在嚷,像没有牙的孩子在弄玩具,像无缘无故的笑。从此,鱼头成了你最亲的人,它让你爱,也让你伤心。最要紧的是,这伤心并不伤人,你的心愿意并一直

收藏它——人类内心的收藏欲望让艺术最终成了一种可能,并一直延续到今天。

艺术没什么力量,小说也没什么力量,短篇小说也没什么力量。如果有,那一定是它涉及到了生活或人性中最核心的内容。这个最核心的内容也许和种族有关,也许和时代有关,也许和历史有关,但是,也有这样一种可能,和它们通通无关。真正有关的是,有一类被称作“作家”的家伙,他们在私底下偏执地喜爱他们感受生活的方式: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在我看来,短篇小说的真谛就在这里。短篇小说从一开始就是做减法,减去什么呢?我不知道。我就知道一点,那些被减去的部分成了我们的日子,需要我们去“过”。

摘自《世界文学》2010年第6期 毕飞宇/文

“文化焦虑”弥漫当代社会

一种浓郁的“文化焦虑”,弥漫在当代中国社会。随着国门的打开,以西方文化为主体的外来文化通过各种渠道不断涌向中国。以节日为例,圣诞节、情人节、复活节、狂欢节等各种洋节在我国日益热闹,而国内的很多传统节日则被冷落。尽管我国各地正不断加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但我国的物质和非物质传统文化遗产还是在以惊人的速度衰落,城市和乡村里的很多历史文化遗产以及各地的人文景观随着“旧城改造”和农村模仿城市的时尚建设不断消失。于是,有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和各界人士呼吁保护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这种文化焦虑中有深沉的反思和忧患意识。因为,任何一种知识和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都是有延续性的,现代知识和文化的传承不可能以斩断历史的方式来进行。

当下,“文化焦虑”和“文化忧虑”促使一批专家学者致力于传统文化的复兴和教育,但他们过分片面地把中华民族文化等同于汉文化甚至一些儒家古典文化,特别是片面地把所谓的“国学”指称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全部。一说到中国文化,言必称“国学”,视野局限在孔孟儒家之学和“四书五经”等汉文典籍上,把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等同于进行一些儒家古代典籍的教育,不遗余力地在大中小学里进行所谓的“国学教育”。

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并不完全等同于对传统的汉文化的认同。鲁迅、胡适等一批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早已看到了以“四书五经”等为载体的中国汉学典籍中的大量糟粕,所以才振臂呼喊引进“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新文化运动使中国博采众长,吸收了西方的科学和民主精神,才创新而形成了绵延至今的中国新文化。如果依旧拘泥于儒家典籍的故纸堆中,不知今天的中国文化会是一个什么格局。今天,享受着新文化运动丰硕果实的我们,不应忘记鲁迅先生等一代哲人那些深沉理性的警示和呼喊。我们在为国忧心、为族忧患的“文化焦虑”中,不能把眼光仅仅盯在自己已有的文化传统上,老想着要不分良莠地一股脑继承过去的文化传统。用一句过去时髦的老话说,我们今天应该“胸怀中国,放眼世界”,不要只顾爱不释手地捧着“国学”的一些典籍沾沾自喜,而忽略了与时俱进地学习、汲取和创新,忽略了向世界学习,取他山之石,为我所用。

中国古话说,“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我们对自己的文化既要自重又要具有自觉意识。任何一种文化,只有如活水长流,才会有生命力,如果只是固步自封自恋,不思向别人学习和创新,那就会日益成为一潭死水。“文化焦虑”促使我们忧患和反思,但我们的这种焦虑,应促使我们有准确理性的“文化自觉”,催生不失根本又汇聚百川、广采博纳的当代中华民族文化。

摘自《人民论坛》第2期 杨福泉/文

让音乐回到现场

2005年,我曾经满怀信心地宣称华语歌坛进入了“数字元年”,彩铃衍生的巨大利润让我以为数字音乐产业将挽救华语歌坛。几年过后,几家欢喜几家愁,数字音乐确实烹制出了巨大的蛋糕,然而歌坛本身仍然在嚼着方便面憧憬着未来。

“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这就是当下的歌坛一个侧面——也许刻薄了些。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华语流行歌坛还有另外一个侧面:

有心的音乐人仍然要“上下而求索”,而这一求索渐渐地发现了一丝生机,为了“把根留住”,音乐人开始回归,“万涓成水,终究汇流成河,像一首澎湃的歌”。这一首歌就是“让音乐回到现场”。

音乐回到现场在CD伴随电视晚会泛滥的时代曾经只是一个传说,它在今天王者归来并非是哪些人一相情愿的产物,实在是我们这喧嚣浮躁的时代所引发的一场平民风潮。

曾几何时,我们太习惯于在虚假中生活,起初是电视台,然后是互联网提供的虚拟世界真切得让人们已经忘记了泥土的芳香,高度发

达的录音录像技术让我们沉溺在虚拟的完美之中。终于有一天,当虚拟也可以令人窒息的时候,我们发现有时候跑音才意味着真实,缺陷才表达着完美。

让音乐回到现场,是时代的选择,也是华语流行歌坛重新绽放的前提。十余年来,华语歌坛创造力的不振是不争的事实,这也就仍然需要呼吁我们的音乐人少点娱乐精神,多点艺术责任——这世界上已经有太多的人供大家娱乐了,不太需要音乐人去添乱。音乐人固然没什么清高,至少还应该以声传情,直指人心。

摘自《艺术评论》第2期 金兆钧/文

在我看来,儒学当中,可继承的东西很多,比如“仁”。

仁爱是儒家的核心价值,仁学是孔孟的卓越贡献。它的基础,是一种“人皆有之”因此可以“不证自明”的“人性的善”,这就是“亲亲之爱”。既然是“亲亲”,那么,子女要爱父母,父母也要爱子女,这就是“对等相爱”。同样,亲兄弟要爱,堂兄弟、表兄弟、族兄弟,以及相当于是兄弟的乡亲、同学、战友、异族和外国人,也要爱。这就是“顺序延伸”。于是,从纵向的孝和横向的悌出发,将心比心,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就可以让世界充满爱。这是一个伟大的理想。

何况做起来也不难,不过“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或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是“忠恕之道”。这是行得通的。自己不愿意的,也不强加于别人,有什么难呢?就算没能力帮别人立,帮别人达,不嫉妒,不破坏,不阻挡,总做得到吧?

如果连这也困难,那么,还有“恻隐之心”作为底线。前不久,许多媒体都相继报道了当年的红卫兵向被迫害者道歉一事,很让国人震撼。其实反过来想,如果那时他们能有“不忍之心”,又怎么会对自己老师和长辈恶语相加,拳打脚踢?也就没有后来的良心谴责和内心煎熬了。“于心不忍”这一“念之羞”,岂非极其重要?

这就是孔孟的“仁学体系”。它有一个靠得住的基础(亲亲之爱)、一个行得通的方法(忠恕之道),还有一条做得到的底线(恻隐之心)。靠得住,行得通,做得到,就不是“空中楼阁”,也不是“空头支票”,这很了不起。

不过更重要的,还在于仁爱作为儒家的核心价值,同时也是人类的共同价值,体现了人类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追求。事实上,东方与西方,过去与现在,没有哪个民族,会把仇恨当作核心价值观。因此,尽管孔孟仁学当时就遭人诟病(比如墨家的批判),后世也遭人质疑(比如“五四”的批判);也尽管它的某些具体内容,包括父慈子孝和兄友弟恭,仍不乏可以商量之处,但它的基本内核是合理的,也是可以继承的。

符合人类共同价值的,就弘扬之;不符合,就抛弃之。这就是我主张的取舍标准。

摘自《南方周末》1月20日 易中天/文

道“槛”。

由于此前全国博物馆在免费开放过程中遭遇了“客流井喷”的尴尬,也有不少人担忧:美术馆、图书馆的免费之门打开时,同样会人满为患。

“免费开放了以后服务是否跟得上”、“门票预约过程是不是很繁琐”,成了网民关注度最高的问题。据了解,一些已做好免费开放准备的美术馆、图书馆对此也“严阵以待”,准备采取电话预约、限制入馆人数等方式,迎接可能出现的大客流。

美术馆、图书馆、文化馆免费开放赢得老百姓一片叫好声。但如何把免费的“文化大餐”、艺术大餐烹饪得更加精彩诱人,如何给国人提供更为细致、人性化的服务,增添城市的人文气息,提升市民的文艺素养,才是公共文化场馆面临的最大挑战。

在河南等地,博物馆的免费开放在短期内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但一段时间之后,又陷入冷清局面。“公众最关心的不仅仅是公共文化场馆是否免费开放,也包括展览内容是否吸引人。”

专家指出,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国民高素质,与其城市中比比皆是、免费开放且展览水准很高的美术馆、博物馆、图书馆有着很大的关系。眼下,我国公共文化设施从过去的低靡收费和象征性收费,最终过渡到全面免费,是社会进步的一张“试纸”,不仅惠及社会公众,意义也尤为深远。

摘自新华网 2月12日 孙丽萍、许晓青/文

低层次模仿『杂耍化』祭天表演唤不回尊重

今年春节期间天坛举办的“祭天圣典”,短短几天时间,吸引了31万游客,从商业角度看取得成功。然而,在网上,它却招来一片指责之声。“为什么要再现史上最腐败王朝的祭天仪式”、“祭天舞酷似黑社会的斧头帮”、“搞这么多人扮演太监,弘扬的是什么文化”、“沉迷皇权,彻头彻尾的一副奴才嘴脸”……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祭天圣典,本是中华民族用来表达终极关怀的重要仪式,面对现代化带来的身份认同危机,从传统中寻找慰藉,也属人之常情,可为什么大家并不领情呢?不仅没唤起人们的尊重感,反而斥之为“滑稽戏”?

对此,民俗学家高巍报以苦笑:“这只是表演,其中不规范的地方实在太多了。”

古人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正是因为高度重视,严肃对待,才使祭天超越了仪式层面,给人们的精神带来神圣感和超越感。因此,只复归形式,不复归内涵,难免沦为表演,甚至被“杂耍化”。高巍认为,这种“仪式”搞得越隆重,结果就越危险,因为明摆着是假的,和现代社会之间找不到结合点,对于懂的人来说,这种低层次模仿漏洞百出,近似儿戏,根本不可能唤起尊重感。与其这样,不如干脆艺术化处理,这样至少还能更通俗、更富娱乐性。

原本严肃的祭天,被搞成表演,体现了祭祀本身的尴尬。事实上,祭祀是几千年文化积淀客观形成的,通过祭祀,人与自我达成更有效的沟通和交流,心灵因之得到净化和提升,在历史上,祭祀一直起着重要而积极的作用,不应一概否定。以祭天来说,古人的概念中的“天”并非天空,它代表的是冥冥中的力量,所以《易经》中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古人重视天,将祭天仪式搞得异常隆重,并非源于愚昧和迷信,而是将它作为净化人心、实现和谐、警醒自我,达成良治的手段。而在敬天法祖的传统中,缺失了祭祀这一关键环节,则这些美好的价值观很容易成为无本之木。

今年庙会,一个突出现象是人们对传统越来越关注,高巍认为,随着物质条件的改善,今人对庙会已脱离了吃与凑热闹的低层次需求,更希望在精神文化上得到满足。

摘自《北京晨报》2月15日 陈辉/文

让郭晶晶当官是滥用公权力

郭晶晶要退役,没有人担心她退役后找不到工作。因为眼下“赛而优则仕”的惯例,她拿到了事业单位“铁饭碗”。甚至她2007年还在国家队训练比赛时就已经是河北省体育局运动中心的副处级干部了。就在郭晶晶提出退役申请的前后,浙江省体育局帮助15名退役运动员集体登报求职,客观上造成了大多数运动员没有时间学习文化知识或其他技能,从而丧失了自主择业的能力。

在奥运金牌带来的巨大利益中,有些是“郭晶晶们”为国争光的合理合法回报。政府的公开奖励是有明确规定,也符合国际惯例;企业赞助行为也是市场规则下

的等价交换。这些是被公众普遍接受的。但奥运冠军们迅速“变身”公务员或“准公务员”,甚至用金牌换“官帽”的现象就另当别论。

刚退役就火速“当官”,甚至未退役就“官服加身”,且不论程序上是否符合公务员和事业单位“逢进必考”的规定,在长期封闭式训练的体制下,他们有可能在应付每天大运动量训练的同时,还自我充电,获取“当官”的资质吗?在其位而不担任领导职务的人士,需要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具备能力,承担责任。把官位当做荣誉授予“郭晶晶们”,是一种行政失当,有滥用公权力之嫌。对奥运冠军频繁“当官”、“火速”当官的质疑,其实是对社会公平和竞争规则缺失的质疑。

摘自《京华时报》1月31日 李丽等/文